

以生命的名义

高洪波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前，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两段意味深长的话，这两段话出自他的《迷鸟集》，译者为湖南老作家任光椿先生。泰戈尔这样说道：“总有一天，我们将懂得，死并不能夺走我们灵魂所获得的东西，因为它的收获与它自身已结为一体。”接下去，在第 322 节他更认真地强调：“我痛苦过，绝望过，也体味过死亡滋味，正由于此，我因活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而感到无比的欢欣。”

《迷鸟集》是一本极薄极薄的小书，20 年前的出版物，是冰心译的《飞鸟集》的姊妹篇。我抄录它的时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北京非典肆虐之际。之所以想到泰戈尔，是因为身边发生了一桩悲惨的事：中国作协所属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青年干部赵子亮，也是我的邻居，他在天津肺科医院工作的医生父母赵世勇和孟淑琴不幸染上非典，在三天内先后逝世！

子亮属猴，与我的女儿同岁，我上楼去探望他时，看到这个陡然成为孤儿的小伙子，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在这揪心的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不可企及的乏力，一切劝慰固然能稍许温暖子亮的心，但失去双慈的巨大痛楚又岂能是任何抚慰所能替代了的？百般无奈之中，我试图平静下来写些文字，一封信或一点建议，把自己关于生与死、存在与消亡、偶然与必然等的理解写给子亮，让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稍许减轻一点痛苦。可是提笔之际，我再次感受到文字的软弱，我终于还是搁了笔，在泰戈尔这朴素而深沉的诗句中，反倒觅到了一种安宁。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赵子亮的大学老师

鲁景超同志含泪写下了一篇记录非典的文字：《一封未能发出的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热点解读”栏，让广大读者感受到一种失去朋友和亲人的悲哀，是祭文悼文，也是向万恶的 SARS 病毒宣战的檄文。读鲁景超文，我沉重的心略感释然。父母双亡而不能到场，临终之际而无法探视，连双慈的遗容都不能见上最后一面，这又是何等残酷、何等无奈的大悲凉之事！故我不敢面对子亮，当我知道那一天深夜子亮买了香烛纸钱独自到三环路口面朝天津方向默然焚化时，我惟有长叹和椎心的伤感。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非典离自己很远的话，子亮父母的逝世让我感受到非典就在身边，在你的亲朋好友和一切善良大意的人群里。那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冠状病毒，毒如蛇蝎猛如狂虎，一旦得手，万难救治，我由此也理解了 2003 年北京的春季所发生的一切。

我比许多作家朋友幸运，因为受中国作协党组的委托参加了中国作家赴抗击非典第一线采访团，这种机遇使我在独自面对赵子亮这样个人悲剧的同时，又目睹了整个北京保卫战的方方面面，从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到艰苦卓绝的阻击战、阵地战，直到英勇无畏的攻坚战。这期间我和采访团的伙伴们，或集体采访，或小分队出击，上至北京抗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会议，中至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下至街道办事处和佑安医院，我们的足迹所及，还到达了庄严的外交部、神奇的国家气象中心和严肃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一下子面对着大量的丰富而又宝贵的信息，像一个采矿者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富矿。我们激动，我们感动，为共和国和共和国的首都，为我们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为总书记、总理的那种“揪心”，也为坦然出征从容赴难的白衣战士，为他们清澈而又坚定的目光，闪耀着的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

神；我们激动，我们感动，为那些在困难的日子里向北京提供物资保障的广大商业战线的职工，为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为公交战线从不停转的车轮，这种精神甚至体现在一个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身上：在空旷的 5 月 1 日的大街上，他独自默默地轻车穿行在路上，他认定只要有出租车行驶，就说明这个城市在运转！他不是为自己，他为的是北京！我们激动，我们感动，最难忘的是置身在北京佑安医院，在小小的一间办公室，坐着院长、副院长、传染科主任、护士长、护士和痊愈的非典病友，院长赵春惠讲述着这家北京第一家收治非典病人定点医院的艰巨过程，讲起收治的那名“毒王”带来的严重后果，讲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她说当时有 12 名医护人员倒下，可同志们仍然纷纷请战，就在这间屋子里举行了 3 名新党员的入党仪式。说到这里，赵院长哽咽了，她说我这人比较坚强，三年没流过泪，这次却没忍住。

那次发言的还有高大的汉子杨建国副院长，他讲到这次非典疫情太特殊，特殊到医生同样面临感染，过去医生见惯了病人的生与死，这次面对的却是自己的生与死！说到这里，杨副院长也落了泪，“我们奉献的不是汗水和泪水，是鲜血和生命！”他这样说道，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躺倒，而躺倒的主要原因是劳累过度，他内心的痛苦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

在佑安医院逗留了不过两个多小时，发言的 5 个同志，却都哽咽难言，泪流满面。这是经历过大风大雨大艰难之后的一种宣泄，也是人性中大善大慈大仁义的一种流注，这是心底圣洁之泉的涌动，也是白衣天使们真情的迸发。如果不是置身于那个特殊的环境，身边是活生生的动人事例，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刚从死亡

线上挣扎过来的非典患者，我们的激动和感动必定有几分矫情。

和平的日子里遇到没有硝烟的战争，你又有幸深入到弹雨横飞的前沿战壕，聆听厮杀者的心语，不是幸运又是什么？！

此刻，我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梁秉堃同志坐在北京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我们采访六位特殊人物：曾被隔离两周的 29 号楼居民。这座楼属中央财经大学宿舍，曾一度有 17 人感染非典，有 5 人不幸逝世，在紧急情况下，4 月 24 日下午 5 时整幢居民大楼被隔离，我们此时面对的就是隔离区内生活了 14 天的居民，背后则是皂君东里 29 号楼全体居民献给办事处的一面鲜红的锦旗，上写八个大字：“战士风格 公仆典范”，时间是解除隔离的日子：2003 年 5 月 8 日。对于 6 位当事人来说，5 月 8 日是他们终身难忘的日子。

提起隔离，六位居民都有说不完的话。是啊，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邻居、同事、熟人病的病，走的走，有的甚至被非典夺去生命。79 岁的白发老教授姜维壮也感觉到某种危险正在来临，知道要封楼了，儿子提供了住处，小女儿开来了汽车，大女儿边打电话边哭，催老人赶快离开，可姜教授还是下定决心留下。事后他解释原因，说有三条理由：一是相信党和政府；二是配合政府的政策；三是有研究生答辩的课题，不能耽误。

结果倒好，隔离之后，家里电话差点儿没被打爆，几十年没联系的老朋友都来电话问候。当天晚上办事处送来一箱子米面鱼肉，接着是蔬菜水果药品，生活很正常。姜教授认为这次隔离浓郁了三种感情：友情、党情和亲情。他还用 16 个字对这次抗击非典进行概括：“风险为人，临危舍身，逆境弥坚，万众一心。”

促使老教授产生上述感慨的是北下关街道办事处的工委书记曹成恩，尤其是“风险为人”和“临危舍身”。因为隔离期间楼

内的垃圾道堵了，气味难耐，更可怕的是当时清洁工逃走了许多，没人干这活儿，有人甚至放出话来：“给十万元也不干！”都知道 29 号楼的特殊和恐惧。这时候曹成恩默默地拿起工具和消毒水，穿上防护服平静地走进隔离区，先用水冲，后用棍子捅，三个多小时之后，捅开了阻塞了几天的垃圾道，7 个人分装，居然装了三十几袋子。那滋味可真不好受，用曹书记的话说：“味儿真大，戴着厚厚的口罩，三个钟头下来，嗓子眼儿是咸的。”

再细问当时的想法，曹成恩这位转业军官很朴素地说道：“说一点儿也不怕是假的，都知道楼内肯定有非典病人的垃圾，可是办事处是政府最基层的组织，这时候最能检验公务员的素质，我不上谁上？”他就这样微笑着走进隔离区，为人民群众踏踏实实排着忧解着难，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实践着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信念，也赢得了 29 号楼的居民们由衷的感佩和爱戴。

事后梁秉堃同志感慨地说：北下关也是战场，也是一线！街道同志们的工作比医院还艰难。抗击非典的这场斗争是净化灵魂的斗争，也是显示大善大美大爱的斗争，是充分闪现人性光辉的特殊时期！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一切。

我认同作家采访团中年纪最长的这位老大哥的肺腑之言。事实上，北京保卫战，可以说处处是战场，无处不前线。在这场与 SARS 病毒的斗争中，党和人民，政府和群众，上级和下级，单位、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一场人民战争的号角响彻在北京的天空，以生命的名义，昭示着我们必胜。

是的，由于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有过太多的压抑，当阴霾一旦过去，我们才百倍珍惜明媚的阳光，珍爱阳光下儿童的奔跑，扭秧歌的鼓点，甚至小贩的叫卖和罕见的拥挤。这拥挤的感觉一度离我们异常遥远，亲切和亲密的人际关系也一度成为禁忌，每

一个人，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有可能携带冠状病毒。恐惧是无名的，恐惧又是无形的，当我们面对恐惧无可奈何时，却有一批勇者挺身而出坦然相对，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付出了远比平常时期更加非凡的努力，他们的泪水和微笑，他们的汗水和业绩，他们的敬业与良知，将永载史册。

以生命的名义，体验响亮、感动。生命对于所有的人都只有一次，在死亡与灾难面前，生命是平等的，生命同时又如芦苇般的脆弱和无助；但毫无疑问，生命又是骄傲而伟大的，显现着人性的光芒，在危急时刻焕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尤其当生命被赋予崇高信仰和使命之际，她昭示出的灿烂明亮与美丽，是永恒的爱折射出的宁馨与安详。

以生命的名义，来感激灾难，感激非典，这注定是一批巨大的财富，储存在一个民族的记忆之中，等闲不会忘却。

以生命的名义，感念所有的英雄、烈士，感念每一个失去生命的不幸者，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我为他们祝福。

以生命的名义……

2003 年 6 月 10 日夜 北京首次

迎来五个“零”：无确诊、无疑似、无死亡、
无既往疑似被确诊、无既往确诊转疑似病例

高洪波

男，中共党员，51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联部主任、《诗刊》主编。主要作品有《高洪波军旅散文选》《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等。曾获全国第一、第三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

北京保卫战（节选）

何建明

22 年前的 5 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 22 年后的今天，当北京的 1300 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深爱你们……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十 万 火 急

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 把过了 50 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战争对很多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虽说 SARS 挑起的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然而其激烈和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仍在冒着硝

烟的美国为首的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的攻击。

4月初，惨遭 SARS 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于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恶兆。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贴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到底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药能抑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同时更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恐慌心态下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当日的《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传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骤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却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儿抓药给我们！”

“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

“狗日的，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

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

纸，捂着嘴，面容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像是垂死前抢捞着惟一的那根稻草……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用六头八臂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个不停。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他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

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

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

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好，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

“老板，话可是你们说的啊，要是你们供不上，误了人命就找你们算账，到时可别像乌龟似的缩头缩脑啊！”

郑店长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我们也是尽力嘛。”那双焦虑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陈济生。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抄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长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午夜 12 点整。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

黎明时分，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

“我们要订 5000 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

“8000，我们要 8000 服！马上就要！”

“给我们订 10000 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

“我们也要 10000 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

“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

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徒有虚名。在 1000 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人声鼎沸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年轻人的眼睛红了，那是被泪水呛着的。他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人命关天时，皇帝又能怎么着？

“哎呀，是陆市长啊！”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年轻的陆副市长。

“诸位，咱们赶紧商量一下，这样可不行！”陆副市长叫过陈济生等人，来到后堂。

“我们已经调出了所有人力物力，可也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啊！今天是9号吧？9号一天卖出9万服！天文数字！”陈济生心急如焚。

陆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

“可我们已经把所有库底全部调上了！再要每天抓出这么多数字的药来，就是挤干我千名职工的血汗也不成呀！你没看见我们抓药的人，一个个眼睛都抓得冒火了！”陈济生本想在市长面前诉一声苦，却见平日里英俊潇洒的陆市长可怜巴巴地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做着抓药动作，眼睛好一阵酸，狠着劲说：“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将手工抓方煮药改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提……”

“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陆副市长问。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采用机器煮提药液。”

“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轻市长一拍定案。

“好的。”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

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开足马力，日夜不停。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

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朋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 10 万服“八味方”！

10 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 万服不够就再加入到 15 万服！

15 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哭着向陈济生报告。

日供 20 万服！陆副市长下令。

20 万服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 4 月 8 号一直供到 4 月底的 20 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 800 多万服！其中 23 号和 24 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 29 万服和 29.5 万服！

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4 月 17 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 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 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担当。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 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革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却正式上任。21 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 62 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 23 部电话全部开通，30 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

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程的战斗内容。

防护服太需要了！

可恶的 SARS 此时正以最疯狂的进攻，袭击着医务人员。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 SARS 患者中有三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拥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 5 个倒下了？”

“我们昨天刚拉走 4 个，今天又躺下了 7 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长、市委书记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你们要是没能耐，就统统下台吧！”市府热线电话里，市民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包含着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和焦虑。

平时，举手投足都讲究得体的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

“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接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做

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有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是啊，国难当头时，每个公民、每个单位，都是政府和人民的一分子，相互间不分你我，不分公私，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一个碉堡里的机枪手，共同的敌人是 SARS！

陈济生又闪出另一个念头：当年林巧稚大夫给我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啊，济生，济人民、济国家、济民族之生！

小女子有个“济生”的男儿名字，大概命运早就安排她担当国事民生的大任吧！陈济生在此刻很感谢林巧稚大夫——那是一位真正的给予别人生命的天使。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抄起手机，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赔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

“是。”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

要命啊！

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层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 SARS 患者的情况。

十万火急！

“向全国、全世界订购！”

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儿那个嘛！”有人提出异议，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

“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 2 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一位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 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性命啊！”

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凌晨 4 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和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从不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她的市民生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她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

“就用传真！我签字！”

“人家要 200 万预付款。”

“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
10 万套给我发到北京！”

“对方答应说行。”

陈济生的电话刚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一个紧急会议。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扯着胳膊，互相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

“口罩 20 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他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太，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运到北京、送到医院、递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

（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 SARS 战役中所用的 1100 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着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意。）

“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电话。

“我们的 10 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电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

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

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里。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儿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 10 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片成片地倒下！”陈济生说。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他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他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

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七点左右抵达北京。

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

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溢出眼眶。

这一天 8 点钟左右，10 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20 万套！50 万套！100 万套！200 万套！

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 200 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成片倒下的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